

沈奇诗学论集

COLLECTED ESSAYS ON POETRY AND POETS

沈奇 著

沈奇诗学论集
2011年11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沈奇诗学论集

(卷二)

—— 大陆诗人论评 ——

沈 奇 著

沈奇的诗歌评论

于 坚

作为中国举足轻重的诗歌评论家，沈奇的意义在于，他的评论使当代诗歌评论的天平得到某种重要的平衡。相对于当代文化的话语权力中心而言，我特别强调沈奇的外省身份，这种身份使他超然于话语权力游戏之外，坚持着诗歌批评的良知、公正性以及有效的专业精神。沈奇评论的魅力，在于他总是保持着敏锐的感觉和朴素的价值观，以及具有独创风格的鲜活语言和一语中的的精彩阐释。沈奇的声音非常原始。他坚决拒绝因为对诗歌毫无感觉又要把这碗饭混到底，从而只剩下狡猾世故的修辞技术的学院式批评。他敢于直言不讳，在基本的美学判断上，决不模棱两可，决不模糊他对诗歌质量的是非好恶；他心直口快，有感而发，并不因此缺乏深度，而是比那些故作高深的时文更有力量和阅读的快感。

因此我们发现，在当代诗歌批评由于长期以来的鹦鹉学舌、味同嚼蜡，已经完全不知所云，几乎被遗忘、付诸阙如的时代，沈奇的诗歌评论一直是中国诗坛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亮点。

2005年3月1日于昆明

· 目录 ·

沈奇的诗歌评论（卷二序） 于 坚

辑一：

· 于坚论

01. 飞行的高度——论于坚从《0档案》到《飞行》的诗学价值

19. 隆起的南高原——论于坚

· 伊沙论

26. 斗牛士或飞翔的石头——初读伊沙

34. 伊沙诗二首点评

42. 与唐诗对质——评伊沙长诗《唐》

· 麦城论

48. 提前到站——初读麦城

58. 在困惑里雕刻时光——评《麦城诗集》

69. “水，一定在水流的上游活着”——论麦城兼评其长诗《形而上学的上游》

辑二：

83. 诗在西北

96. 世纪之树——感受牛汉诗歌精神

· 目录 ·

102. 倾听：断裂与动荡——阎月君论
117. 秋水静石一溪远——论赵野兼评其诗集《逝者如斯》
127. “太阳拎着一袋自己的阳光”——严力诗歌艺术散论
138. 收复命运——评中岛和他的诗集《一路货色》
149. 两个“莽汉”与一个“撒娇”——评李亚伟、默默诗合集《莽汉·撒娇》
160. 执意的找回——评古马诗集《西风古马》
169. 诗城独门——评陆健诗集《名城之门》
180. 展开的河流——评《陆健诗选》
183. 守望、挽留与常态写作——李汉荣论
193. 烛照一层特异的生存意蕴——评孙谦诗集《风骨之书》
198. 静水流深——评杨于军和她的诗
211. 雪线上的风景——诗人沙陵散论
221. 沉默者之光——评关雎诗集《沙漠中央》
224. 裂变与再生——牟心海诗歌创作散论
236. 风清骨奇心香远——评吕刚的诗
243. 为诗的诺言书写寂寞——评刘文阁的诗
247. 气血充沛 风神散朗——评刘向东诗集《母亲的灯》
253. 纯驳互见 清韵悠远——评彭国梁诗集《盼水的心情》
262. 奇异的果实——评麦可的诗
267. 读高崎的诗

· 目录 ·

272. 群树的呼吸——评《诗歌报十年精华》

281. 回望中的一片灿烂——读《遵义九人诗选》

辑三：

287. 永久的风景——读卞之琳《断章》

290. 澄明之境中的月光浴——读王小妮《月光白得很》

293. 以何种方式守望及守望什么——读余怒《守夜人》

295. 迷途忘返别样看——读多多《我读着》

299. “说事”与写诗或借题发挥——读于坚《塑料袋》

302. 与诗有约——读张枣《预感》

305. 返璞归真 自然天成——读唐欣《在青海某地停车》

307. 向晚的仰瞻——读王寅《我敬仰作于暮年的诗篇》

310. 寻常翻出新意来——读翟永明《在古代》

314. 认领真实与重构美学——读沈浩波《静物》

316. 纯净的深度——读水晶珠链《无法沟通》

318. 平实与空茫——读雷平阳《小学校》

321. 阳光礼孩的阳光浴——读黄礼孩《窗下》

324. 清简一苇天地心——读娜夜《起风了》

327. 拾一粒石子听涛声——谈我的诗作《上游的孩子》

飞行的高度

论于坚从《0 档案》到《飞行》的诗学价值

引言：从批评说起

在世纪末的中国诗坛，大概还没哪一位诗人遭遇像于坚这样尴尬的批评处境：一方面，作为坚持民间立场之纯正写作阵营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不断在官方（如《人民文学》等）和海外（如《联合报》等）获奖，大获张扬；一方面，在备受阅读层面（包括诗界以外的阅读层面）的好评和赞誉的同时，却又总是为诗歌批评界（尤其是学院批评）一再冷落或叫作疏淡，以至又屡屡让海外的现代汉诗诗学界独享其成。双重的尴尬使于坚难免有些“恼火”，他讨厌“主流认同”的阴影，也反感“国际接轨”的幻影，在无奈中接受这些“阴影”与“幻影”的些许慰藉之后，来自纯正诗歌批评阵营的冷淡越发显得让人难以理解。诚然，在经由非批评通道而早已立身入史的于坚而言，这种“恼火”有时看来不免多余，但又无不透显出这位诗人

2 沈奇诗学论集

某些未泯的童心和赤诚的情怀——他一直在纯正诗歌批评界那里寻求着一种理所当然的认同，以安妥这样的童心与情怀，因为历史已经认领了的这种“认同”，在新诗潮勃发至今的二十年中，是怎样的亲切、怎样的可敬和怎样的重要，以致使整个纯正诗歌阵营，形成了一种无法绕开他去的批评期待，乃至不管这种“认同”是否也会发生必不可免的错位或告竭。

“我以为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最荣耀的莫过于在北大这样的地方讨论他的作品……”这是于坚在1994年12月15日下午，出席北京大学部分师生由谢冕教授主持的“对《0档案》发言”座谈会上的由衷之言，至今读来让人感叹不已。显然，对学院批评“认同”的“期待”，在于坚心里也是一个颇具分量的情结——遗憾的是，四年过去了，这情结依然为尴尬所“认领”。

是于坚“错开”了批评界？

还是批评界“错开”了于坚？

不是说错开了于坚就是批评的失职，其实这是两方面的问题，让人感兴趣的是这问题中包含的某些启示：经由前新诗潮（主要是朦胧诗）批评的辉煌成就，似乎也逐渐形成了某种“批评期待”——期待新的“北岛”、新的“舒婷”、新的“朦胧”（以致有了“后朦胧”、“后新诗潮”的含混定位）以及新的“海子神话”，以沿着既定视野扩展中心不变的批评格局。于坚显然是作为这一期待视野之外的“异类”突起于批评家面前的，他使他们同样感到尴尬，从而被迫选择了仅属于诗歌史范畴的认领而非诗学范畴的认同。因此，便再一次错开了为九十年代中国诗歌贡献了《0档案》和《飞行》两部巨作的于坚。这其中，已将于坚视为功成名就的历史人物，是可能的心理机制。同时，于坚一再被看作同样已功成名就的“他们”诗派的一分子，亦即划归为已有定论共识的流派诗人之一，大概也是一个潜在的批评盲点。其实就创作而言，无论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于坚都完全是

一头卓然独步的雄狮，加盟“他们”，也只是气质相近而非风格相投。“我的梦想只是写出不朽的作品，是在我这一代人中成为经典作品封面上的名字。”^① 这“梦想”可说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那么何谈“尴尬”呢？历史常常让一些优秀的人物成为孤独的狮子，该消解的是于坚不必要的“恼火”。而对批评的盘诘，就本文而言，也只是为我同样可能力不从心的诠释，作一点铺垫——我只是不愿再“错开”，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批评者，出于良知还是出于责任，我都无法再绕开于坚所提交给我们时代的诗的高度，去作其他的言说。

补遗：对《0 档案》发言

在当代中国诗坛，于坚一向被指认为具有前卫性、先锋性和实验性的代表诗人，属于超越时代步程的前沿人物，而于坚自己则声称：“我实际上更愿意读者把我看成一个后退的诗人。我一直试图在诗歌上从二十世纪的‘革命性的隐喻’中后退。”“在一个词不达意，崇尚朦胧的时代，我试图通过诗歌把我想说的说清楚。”“我是一个为人们指出被他们视而不见的地狱的诗人。”^②

于坚在做这样的告白时，已完成了他的巨作《0 档案》，在人们的各种误读和批评界的广泛失语面前，诗人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些自我诠释。其实，“后退”的态势，是于坚很早就确立的创作立场。退出什么？退出新诗沿袭至朦胧诗依然滥觞的审美范式——高蹈、抒情、翻译语感化，意象迷幻、隐喻复制、观念结石以及精神的虚妄和人格的模糊，失去了对存在发问、对当下发

① 于坚：《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事情（自白）》，《棕皮手记·自序》，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版，第 11 页。

② 于坚：《棕皮手记·1994—1995》，《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版，第 285 页。

4 沈奇诗学论集

言的尖锐性。“人说不出他的存在，他只能说出他的文化。”^① 这是于坚一直关注并力图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解决的核心问题。把话说清楚，并发掘过去和当下诗歌中存而未说的东西，以重新恢复汉语在当代诗歌中的命名功能，遂成为于坚诗歌的大抱负。这一抱负的立足点，在于转换话语，落于日常，活用口词，再造叙事，使语言不再空转。语言是文化的本根，文化的疾病首先是语言的疾病。新诗对旧体诗的革命，在于旧体诗的语言在新的生存现实面前打滑、空转，随后新诗自身也渐渐被打磨得空转起来，失去了重新命名的功能，成为一些虚幻的空中楼阁。对此，于坚返身他去，由诗性的歌唱转而为诗性的言说，视日常为理想之体，注重对意义的刻写而非意义本身，回到动词、名词及一切词的根部，客观、坚实、健动、去蔽、朗现、裸呈，以一种不无试错、证伪的态势，通过对汉语隐喻系统的解构，引领人们返回存在现场，从而极为有力而深刻地改造了我们时代的诗歌语境，同时也就改造了我们时代的诗歌精神。

这一语境和精神的集中体现，便是《0 档案》。

于坚创作和发表《0 档案》时，正值诗坛沉迷于“海子神话”时期。当普泛的读者和批评家们，为第三代诗人创化的口语写作和冷抒情弄得不知所措时，突然在最后一位现代神话写作者海子那里，找到了追怀浪漫诗歌的巨大宣泄口，一时关于“麦地”、“玫瑰”和“王”的“海子式意象仿写”，泛滥于整个诗坛，将一场悲剧弄成了盛大的节日。《0 档案》可谓生不逢时，孤独者必须再次接受孤独的磨炼。沉浸在重返神话与浪漫中的人们，不可能对这部毫无诗意可言的什么《0 档案》发生兴趣，以海子为荣耀的北大部分学生，甚至干脆称《0 档案》是“一堆语言的垃圾”。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文化心态，当存在日益暴露出它历史

^① 于坚：《棕皮手记·从隐喻后退》，《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版，第 243 页。

的狰狞与现实的粗陋时，人们所做的不是去清除垃圾，而是踩在垃圾堆上幻想玫瑰的抚慰。其实我们几乎像用旧钞票一样，一再污染和蹂躏了那些曾经多么美好的浪漫语词，使它们变得模糊不清，充满虚妄的唾沫和焦糊的体臭——我们只剩下夸大其词、言不由衷的虚空外表，而远离存在之真实！

尽管，批评界对《0 档案》的冷淡和滞后，是有各种原因的，但从诗学的角度还是从诗歌史的角度，我们都不可绕开这座突兀而起的独在高峰，而言说九十年代现代汉诗的总体进程。《0 档案》所体现的那种巨大的实验力量和完全生疏的形式魅力，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种智慧和意志的而非激情与想象的写作，“用具体、精确、明晰、富有逻辑的语言描述事物”（于坚语）是否能成为诗？《0 档案》做出了极为出色的解答。在这部对文化专制之典型形态即“档案话语”的解构性“命名”的鸿篇巨制中，诗人彻底洗刷了新诗传统中一味追求形而上和浪漫感伤与矫情的遗风，将自己置于“非诗”的边缘，以此来拓殖现代汉诗语言新的表现域度和对历史与现实的穿透力。指认、检视、形而下、以物观物、客观陈述，以所谓“垃圾式”的语言来书写语言的垃圾，以对话语结构的颠覆来抵达对精神暴力的颠覆，所有这些看似与诗性相去甚远的干巴巴的东西，经由于坚式的特殊编码，均产生出异质的活泛和意趣。读于坚的《0 档案》，总使我想到瓦雷里（Paul Valéry）评价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那段话：“明快的魔鬼、分析的天才，逻辑与想象力、神秘主义与精确计算的最新式、最有诱惑力组合的发明者，研究特殊现象的心理学家，研究和全部使用全部艺术手段的文学工程师。”

作为一个被视为“另类”的诗学事件，《0 档案》令当时的批评界长时间处于静场状态。最终，在事隔近一年的 1994 年年底，经由笔者的提议与鼓动，终于引发了由谢冕主持的北京大学“对《0 档案》发言”研讨会。遗憾的是，这一惟一对《0 档案》进行学术研讨的会议纪要，仍因各种原因，未得以在国内公开发

6 沈奇诗学论集

表，仅于1995年的《台湾诗学季刊》第四期上刊出。这里，不妨借这篇论文作一些摘要性的补遗，以便增加一些整体性的认知——

文学博士陈旭光发言指出：“进入九十年代，与席卷中国文化界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相应，先锋诗中有了一个明显的‘回返’现象，即日益丧失在文本中无情解构、颠覆的反叛姿态和先锋精神，‘回返’一种与传统和解或与大众传媒共谋的温情与保守。正因如此，我特别看重逆此潮流而动的于坚的《0档案》写作。它以主题的严肃性，深入到个人生存之集体无意识领域的深刻性及形式上的走极端而保持了难能可贵的先锋精神。”同时，在对于坚先前的短诗和《0档案》写作比较之后指出：“于坚首倡并有效地实践了强调语感、语势的口语写作。这种口语破除语言中的文化性厚积而与个体内的生命体验更为接近乃至同构对应。在他那些短诗的静态文本下面，总是潜行涌动着一种真实的生命呼吸，而在《0档案》中，‘人’死亡了，主体‘缺席’，文本完全静止、平面、无限堆积，没有生命的气息……”陈旭光这里对《0档案》的文本质疑，或许正是于坚所要通过文本达到的效应，因为无论作为文化形态还是现实作用，“档案话语”正是这种让人死亡、让主体缺席而毫无生命气息的东西。《0档案》是一种典型的指认性写作，语言与意义处于一种直接的、自然的关系中，可诉诸此时此地的语境，作者只是指认，将指认后的思与想完全留给读者。

文学博士孙民乐认为：“《0档案》有可以意识到的诗学背景，诞生于对诗歌语言的一种独特的设定和追求，即诗歌语言应摒蔽语言的历史沉积和文化诗意，还语言以原初的‘命名’功能。”并深入文本精细地分析道：“《0档案》以杂沓‘堆垛’的语言策略，打破了横向组合的亲合关系，语调的排泄或倾倒和高密度的铺排，几乎阻断了意义缝合的可能。……没有意义的承诺，只有声音和形体的扭结和横陈，汉字由此似乎回到了仓颉之

前的自在和自然状态，它的物质性从历史幽灵和文化迷宫的禁闭与羁绊中脱颖而出，走向了诗的前台。这是一次真正的‘语言的’建构，尽管语调的历史印痕和文化内蕴并未完全飘然而去，尽管人们依旧可以轻易地从中读出各种历史的、社会的、人生的主题，但这些主题的承载者和承载方式已发生了质的转变。由此，与其说它是一种诗体形式的创造，不如说它是一种诗歌语言的发现。”

文学博士尹昌龙则特别指出：“《0 档案》中的‘0’有一个虚构的喻义，即对自我的消解，而通过社会话语——档案，来看自己，用一种戏仿档案的讲述方式，在对档案话语亦即社会话语规范的解构中找到裂隙，从而在这个裂隙中呈现出个人稀微的真实，这是这部作品的特性所在。”

文学博士林祁认为：“档案是我们熟悉到几乎不注意却又是严重存在的一种文化，人们绝不会想到此中能写诗，于坚偏冒了这个大险。由此他不可能遵从历史的审美习惯，遵从英雄式的、抒情性的表现方式，迫使他另辟险径。他发现档案形式的严密里有裂隙，庄严里有滑稽，简单的词语后面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利用这种档案形式拆解档案话语，是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先锋性实验。”

杨鼎川教授指出：“《0 档案》有意地褻渎诗的高雅，因而多少带有粗鄙化倾向。我使用‘褻渎’和‘粗鄙’不带贬义，对于那样一段可悲的历史，对于那种以类去消除个性、以政治抹杀人性的现实，谁还能认为应当用优雅的语词和风格去抒写？”

谢冕教授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中指出：“于坚和他的《0 档案》的价值在于，他所显示出来的人的语言存在的特殊困境，比同时代的作家和诗人要涵括得多得多。他所要显示的，在《0 档案》中已表现到了极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深切感受的。通过各种语词的有意味的拼凑和堆积，到达一种高度，所堆积的是一个非常宏伟和有深度的东西，震撼人的东西。诗人不应该忘记历

史，忘记是文学家的不幸，诗人必须直面自己所面对的大地和天空，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于坚是这样做的，和那些游戏式的诗人不一样，和那些粉饰性的诗人也不一样。”在做出这样的充分肯定之后，谢冕关切地问道：“我最终想知道的是，作为《0档案》这样‘自杀性’的创作事件，对诗人于坚的创作生涯意味着什么？于坚和他所代表的这批诗人，下一步写什么？怎样写？你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会导致你怎样的新的选择？”

——三年以后，在继续创作了大量高水准的短诗和极具创建性的诗学文论的同时，于坚又向我们提交了另一部惊世骇俗的长诗巨作《飞行》，它所抵达的新的 height，既回答了谢冕先生的悬疑，也验证了陈旭光博士发言中最后的猜测：“于坚这样做是意图要‘置于死地而后生’吗？”

实则《0档案》所开启的诗歌新地并非“死地”而是“极地”——是远离九十年代旧梦重温之普泛诗歌现场而生发新的生长点的“极地”——于坚创造了这样的道路，也就必然有能力使之不断拓展与延伸。

认领：《飞行》的高度

《飞行》一诗，初稿于1996年12月，此后一年中，四次修改，1998年8月发表于《花城》文学双月刊，刊出后，又复改定一次，以最后的定本获首届王中文化奖。前后五次修订，可见于坚对这部长诗的重视。定本计五百三十八行，其中最长的一行诗多达三十一字，大部分在二十字左右，算来全诗万字有余，体积庞大，气势恢弘，无论是其精神含量还是艺术含量，都属“航空母舰”或“空中客车”一类的大诗史诗之作，长而耐读，富有奇趣。假若说《0档案》是一部推向极端的实验性文本，《飞行》则是一部经由整合的经典性文本。二者有共同的品质，如戏剧性、小说企图、命名功能及高密度的铺排、堆垛之语言策略。也

有不同的风格：《0 档案》是单向度的推进，《飞行》则充满了复合的光晕；《0 档案》是对“档案话语事件”的个案性深度剖析，有清场的作用，《飞行》是对“时代精神领空”整体性检视梳理，有建构的意义——我则称之为“超级命名”。

于坚对他的这部巨作题名为《飞行》，在我看来，既是实指，又别有深意。飞行是亘古以来人类的梦想，这一梦想在普通中国人中的实现只是晚近的事情。登上现代飞行器，脱离赖以扎根生长的土地，在一万米高空回视过往的一切，对每个人而言，都无异于一次“精神事件”！我们知道，当宇航员飞离地球，在太空中回望漂浮于黑暗中那颗闪亮的蓝色星球时，曾经发出怎样的惊叹而于一瞬间改变或叫作重建了自己的世界观。这样的“精神事件”，对于刚刚由那么多动荡、忧患、闭锁、文化专制与物质匮乏中走出而重新认识自己与世界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更具震撼力，且更具复杂性。由这一特殊角度切入，遂使诗人的一次短暂飞行变为有巨大穿透力和涵括性的时代表征：现代与传统、梦想与现实、个人天空与历史风云、私人话语与全球一体化以及生态伦理、环保意识等等，无不经由于坚式的“飞行”，得以诗化的展开。“二十世纪的中国诗尚未完全意识到，他们有义务为一个与乡土中国完全不同的汉语新世界命名。”^① 于坚在《飞行》中出色地实现了对这一“命名”的企及——由此，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专制之典型代表“档案话语”做了《0 档案》式的独特命名后，又对二十世纪末中国人的“精神心空”做了《飞行》式的独到命名——如此两个重大的命名由同一位诗人完成，这在我们的时代里，是极为罕见的。

前文曾提到，《0 档案》的命名属于单向度的个案深入，《飞行》则具有整合性的效应。当代中国诸般有代表性的文化景观和

^① 于坚：《棕皮手记·从隐喻后退》，《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版，第 245 页。

10 沈奇诗学论集

世态景象，在《飞行》的视域里，都得以诗性的触及、激活、指认与追问；跨度大、容量大、蕴含深，上天入地，通古涉今，无远弗届，大开大阖，颇具史诗气象。《飞行》的题旨如此凝重与宏阔，落于文本，却无涉文化诠释和价值判断，只在呈示与体认，如同那个巨大的飞行器，只在运行和运行的姿态，无所谓运的是什么，目的何在。“伟大的诗歌是呈现，是引领人返回到存在的现场中。”^①在这里，诗人几乎是用一种抚摸性的眼光，逡巡于“飞行”中所视、所思、所想的一切，依然有批判的锋芒、质疑的灵光、盘诘的烛照，但更多了些达观的情怀和宽容的气息，乃至不避怀旧的意绪亦即文化保守主义的嫌疑，至少是消解了极端性的、不断革命、不断求新求变追逐“现代化”的所谓“先锋立场”。在极言“现代”的喧嚣里，维持心灵的清醒和笔端的沉着，用冷静的头脑支配明朗的墨水，对东西方意识形态、语言形式和表现策略保持从自身经验和由母语根性出发的体认，其实是诗人于坚持之多年的写作立场（这从他许多诗外的文本中也时可见到），只是在《飞行》一诗中，得到了最为集中明确的表现：正负承载，内外打开，“心比一只鸟辽阔比中华帝国辽阔/思想是帝王的思想但不是专制主义/而是一只时间的皮肤上自由活动的蚊子”——这便是《飞行》的姿态，由此姿态所抵达的“命名”，方可“对于人理解他所置身的世纪的状况，是有益的、客观的、真实的”。^②

当然，人们有权利对于坚这种“向后退”与“软着陆”的姿态是否为期过早持以质疑，而从诗学的角度来说，题旨的轻重与姿态的偏正都是次要的，关键要看“命名”的过程是如何展开，

① 于坚：《棕皮手记·诗人何为》，《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版，第 238 页。

② 于坚：《棕皮手记·1986—1989》，《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版，第 257 页。

是否有诗学价值。《飞行》全诗，无非写一位诗人由本土飞往他国途中，于九个小时的特殊时空中所视、所思、所想的种种而已。这既是特殊的时空，又是偶然而普泛的集合，关键是要给出有“命名”性的说法。《飞行》的“说法”亦即“命名”的展开，与于坚以往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飞行》的题旨是复合性的（传统与现代、梦想与现实、个人天空与历史风云、乡土中国与全球一体化以及生态伦理、环保意识、家园情怀等等），由此生成的语境，也便焕发出复合的光晕。就我个人的诗学观念而言，我更看重这种经由整合而重构的复合品质，窃以为这是一位大诗人理应追寻的路向。落于文本的分析，可看出以下几点变化：

1. 主、客互动，重新引进抒情之维

于坚的诗风，向以客观化著称，极少主观色彩，重在剖析存在的肌理，摒弃精神乌托邦的升华，所谓讲言传不讲意会。早期的《尚义街六号》及后来的长诗《0 档案》，是这一诗风的代表。于坚对此总结为“诗是动词”、“日常的”、“不言志，不抒情”，注重“事件”、“仅仅到‘看’而不到‘心’的事件”和“细节”与“具体”^①，并指认“语言，只有当它被‘客观’地使用着的时候，它的一切奥妙才会显现出来”。^②如此的客观必然带来阅读的生冷与滞重，为此于坚有机地引入“小说企图”，着力于对戏剧性细节的捕捉，加之其言物状事的特殊语感（理趣、机巧、精确、道他人之不可道），使之语境变得别具一番灵动与活泛。这种诗风，一举洗刷了长期泛滥于现代诗中的情感夸饰和想象虚浮的弊端，同时也大大拓展了现代诗的表现域度，于坚于此是有创建性贡献的。但完全客观的负面是对抒情的完全放逐，且不说

① 于坚：《棕皮手记·1992》，《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78—279页。

② 于坚：《棕皮手记·1986—1989》，《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43页。